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Zhong Jingwen,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wearing a patterned jacket,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brick wall.

钟敬文 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A cluster of bright yellow flowers with dark centers,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cover.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钟敬文著 董晓萍整理

钟敬文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敬文学述/钟敬文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9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林在勇主编)

ISBN 7-213-01662-8

I. 钟… II. 钟… III. ①钟敬文-学术思想 ②钟
敬文-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025 号

钟敬文学述

钟敬文著 董晓萍整理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 晖(特约)
- 封面设计 信天翁工作室
- 责任校对 韦 伟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 开 本 850×1168 1/32
- 印 张 8.75
- 字 数 17 万
- 插 页 2
-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1662-8/K·485
- 定 价 13.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前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通过杨哲同志告诉我，他们想出一套当代学者学述丛书，每册约 10 万字左右，希望我也能提供一本。我听了颇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要写这样一部学术自传类的书，非有一段优裕的时间不可，而依我现在的状况，是不容易办到的；况且个人在精力上也有些衰弱，不一定能写得好。因此，我虽不大甘心，但还是婉言谢绝了。

今年初，浙江人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一本这方面的书，是傅振伦先生的“学述”。不久，又收到了同丛书中的袁珂先生的一本，这使我不免见猎心喜。我私下里想，不知能否用其他方式弥补一下：我在近年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大多写过一些序、跋文。在这些文章里，我也都大概地叙述了有关的学术经历或成果得失，这也正是一种学术自传类的东西。如果把它们汇合起来，成为一本小册子，也算是一种学术自传性质的论述吧。

我把这个念头说给杨哲同志听，她又转告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部，询问可否变通一下。很快，对方就给了回音，说可以这么办。

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还是没有功夫去干这件事。直到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又来催稿，告知丛书的第二批即将付印。我想再不能推下去了，就把编书的意思，以及我自己有哪些文章需要收进这本集子里的，都告诉了我的助手董晓萍教授，请她代劳。她很快就把书编成了——就是读者看到的这本小册子。至于那些序、跋中有关各书出版、编辑事宜的一些话，因无关本书主旨，就都删去了。有些序、跋的题目根据本书的需要也作了修改。

这本小书，尽管不是系统的学术著作，但是，它对于社会和我个人，或许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对社会来说，它可以提供研究者以参考资料；对于年轻的同志，它也许不啻为一种借鉴和启发之资；对我自己来说，它也可以说是一些比较完整的省察材料吧。总之，它不是一种没用的闲书。

最后，感谢殷勤约稿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好意！感谢杨哲同志的费心联络，也感谢为我付出了辛劳的董晓萍教授！

1999.11.30. 于北师大励耘红二楼

29
121



钟敬文先生



钟敬文先生部分著作

目 录

MULU

钟
敬
文
学
述

前言	1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	1
七十年学术经历纪程	34
“五四”引我走上新的学艺之路	47
我的民俗学学术活动与研究	54
致力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两个重 要时期	83
杭州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工作	97
拨乱后十年间的学术思考	114
学术上的反思与体会	125
我的民间文学观	137
文艺理论的修养与述作	156
我与诗论	165
我的“民俗文化学”思想形成 的来龙去脉	175
关于鲁迅生涯、学艺的论考	182
民间文学教本编纂的缘起与 过程	187

民俗学教学参考书编纂的历程与得失	194
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	199
附 录	221
学术论著要目	223
钟敬文先生的学问	(日)小岛瓊礼 226
整体文化、民俗文化与修辞论诗学	王一川 232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	杨利慧 249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

文溪政径艰难过，
历史平章付世人。

——《住院偶感》七律结联

我出生在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照眼下一般流行的用语,可说是这个世纪的同龄人了。

20世纪,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从世界范围的情形说是如此,从我国一国的情形说也是如此。从关系到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看,中国在这个不平凡的世纪里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

20世纪一开始,就是义和团的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1905年,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使国家进一步濒于危亡之境。1911年,中国人民推倒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17年,第一次欧战结束,参战胜利国的中国却得到与战败国相等的结果。1919年,全国爆发了五四政治、文化运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兴起及遭受挫折。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近十年的斗争。1937年

至 1945 年，是日本军队的人侵与全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斗争。1949 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1957 年“反右”扩大化，许多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1958 年至 1959 年，兴起“三面红旗”运动，厉行“左”倾路线。1966 年起十年“文化大革命”，1976 年“四人帮”覆灭。1978 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

以上所述，只是这段时期里一些关系较重大的事件，像人身上的骨骼。此外，还有那些次要的，就不一一赘举了。我作为中国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在这连续不断的重大事件的惊涛骇浪中漂渡过来的。

知识分子，对于周围的事物，一般是比较敏感的。对于国家、社会的巨大事变，不管他们是自觉地参加进去的，抑或是不自觉地（甚至于不由自主地）被裹卷进去的，那大事件总要在他们的经历上、精神上留下一定的烙印，甚至于斑斑伤痕。

我是这个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闻。但是，在这漫长历史的经历中，总有种种的感受和反应。如果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也可算是这时代的伟大史剧中的断片插话吧。

限于时间和精力，在这里，我只能就上述的重大事件中选择一部分，略谈我的经历和反应。

五四政治、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及文化的大运动！它对中国社会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说，在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我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娃娃，那么，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我已经是一个上过十年新旧学的青年人了。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事情，就我现在所能记忆的，只有两件：其一，在我们那小市镇中心的大街上，看人们在围着念新政府的告示；第二，是我的家人（是不是母亲，已经记不清了）给我剪掉了那条并不长却颇肥大辫子。只此而已。至于五四时期的印象却不不然了。在这之前，我已经上过两三年“子曰馆”，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一类的兔园册子；又进过半新式的学校，在学习算术、格致等的同时，也诵读古代历史和古诗文；并且学作过“爱国论”及旧体诗；此外，还看过孙中山等革命家的传记。这时我已经是一个已具雏形的知识分子了。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剧烈的、全国性的群众政治运动。当时，我们那比较偏僻的小市镇，虽然交通道路、交通工具远远没有现在便利，但是，发生在北京的事情却很快就传播到我们那里了，并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即刻投入了爱国的宣传活动中去。我被选为这种抗日联会的会长，当然要全心全意地奋力工作。我们的宣传队，在大街小

巷演讲、呼口号，还把这种活动推广到附近的大小村落。在市镇的戏台上，我们演出了宣传剧，以揭露敌人的野心毒手和汉奸们的丑恶面目。我本来是颇害羞的孩子，但是，这时也壮着胆子，敢于在睽睽的万目之下登台表演了。

在这种救国活动中，有一项意义极重要、办起来却又相当困难的工作，那就是禁止贩卖日本货。这是从经济上扼制敌人的方法。如果做得好，是可以收到很大效果的。在我们那小市镇上，虽不能说日货充斥，但也已经是到处可见。最惹眼的是洋火（火柴）和洋布（东洋布），后者已经渐渐代替国有的土布了。我们首先是逐户清查，然后把它一一封存，并谆谆嘱咐以后不准再贩进这类货物。但商人大都看重眼前的利益，不肯好好服从，并千方百计对付我们，例如瞒骗存货，偷偷贩卖。有的还进行贿赂，或向我们的家长告状，希望阻止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意志果决，坚持原则。尽管他们使尽心计，乃至于怀恨、咒骂，总不能改变我们的决心和处理。

这种向青年学生威胁利诱的情形，在各地，可能是有一定普遍性的。我当时虽然年纪还轻，坚决抵制了他们的歪风，但心里已经认识到旧社会壁垒的强固，要改造它实在是相当费力的。

这种轰轰烈烈的、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虽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宣传、查货等活动渐渐停止了，但它给整个社会的震撼力是相当强烈的。从我个人方面来说，它不仅是进行了一次社会实践和开始认识到旧势力的顽固，更重要的，是使我的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密切联系起来，并开

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

像前面所说，在五四运动之前，我已经接触到旧文学、旧学术，并且有些喜爱它们。但是，“五四”的文化运动，却使我睁开了原来有些迷糊的眼睛，它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学艺世界！我开始阅读新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也学习创作白话诗、小品文。后来成为我终生致力的科学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种子，也是在那个时期播种下的——因为接触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被深深吸引住了。此后，我便成为“民俗学”这位科学女神的忠实信徒。

总之，“五四”这个政治、文化的伟大运动，在我初涉人生道路的时候，惊醒了我，提携和哺育了我。我对它产生了不能磨灭的感应。它的遗泽一直长流到现在。几年前，我在所写的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的一篇短文里，把它称作“我的启蒙老师”。这是再恰当没有的。只要我还活着，就将虔诚地怀念这位“老师”！

大革命的兴起及暂时挫折时期

中国人民由于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与外国殖民主义者和本国的军阀、政客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于是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流血的大惨案。1925 年的五卅惨案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日本资本家的贪婪、凶悍，激起上海工人的反抗，而租界的殖民主义者公然为日本人帮凶，枪杀工人，血洗了南京路。这桩惨案，震动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奋起抗争，

许多进步的作家(如郑振铎、朱自清等)都发表了极沉痛的诗篇。

在这同时,国民党的左派正与共产党人合作,确定“扶助工农、铲除军阀”的政治方针,并接受苏联的援助,建立了革命新军,清除广东军阀及北伐进军正节节胜利,眼看正义之师就将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而正在此时,国民党的反动派却叛变了革命,实行所谓“清党”,屠杀工农群众及革命人士。这是现代人民革命史中的一个重大的挫折!

我于1926年秋到广州。这时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国共关系也已经出现裂痕。但是,广州原是革命发源地,这时是革命大后方,它还具有一定的革命吸引力,许多北方的进步青年都来这里取经或参加工作。当地的工农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还呈现出蓬勃的气势。进步的文化也很繁荣,有专门出售革命书刊的人民书店,有《人民周刊》等进步刊物,还有创造社出版部和北新书局等北方进步书店的分部或分店。

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如郭沫若、郁达夫等虽然已陆续离去(郭参加北伐军,郁回上海办创造社刊物),但创造社其他一些重要成员,如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等,还在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教书。还有其他进步作家,如王任叔、董秋士、刘乾初等,也先后到了这里(我跟他们的认识以及合作翻译俚僮民歌,就在这个时期)。到了次年春,孙伏园、鲁迅也先后到达,但那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

我虽然生活在学院里,但这种社会的大气候自然要影

响到我。我开始阅读革命的书刊。刊物方面,除了阅读全国性的《向导》、《青年周刊》之外,也阅读本省的《人民周刊》以及《少年先锋》之类。在书籍方面,现在所能记得的,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译本)、《共产主义 ABC》(布哈林著,前苏联党校教本)以及《社会主义史》等。

当时,我除了在《少年先锋》发表些文章之外,又在岭南大学的《南风》上发表过送聂绀弩去俄京留学的诗《到莫斯科去啊!》。诗中表现了我对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敬仰和对于聂此行的羡慕。我也赠诗台湾革命青年张秀哲同志,并为其审阅所译《世界劳动问题》的稿子(后来我在杭州,还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散文)。1925年的“沙基惨案”,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南方人民犯下的一桩罪行。我看了一个画家所绘制的《沙基惨案图》,悲愤之余,写下一首新诗(该诗曾收入我的新诗集《海滨的二月》,1930年刊)。鲁迅到广州时,我曾与友人去访问他,写了《记找鲁迅先生》(此文近来被收入《钟敬文散文选集》中)。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反动派的叛变而暂时遭到挫折。但革命并没有因此断绝。“东边不亮西边亮”,革命的力量终于重新聚集起来,并且不断发展,经过十年内战,它终于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

当革命遭到挫折时,我心里深感悲愤。此时精神上受了这种打击,加以个人感情生活上的某些苦恼,我一时陷于颓废和悲观,但并不因此沉沦,因为许多革命同志和陆师同学们神圣的血在我脑里闪着光。我决心在学术上努力,为未来新生的祖国服务。因此,我曾在那稍后的一段时

间里，一方面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另一方面，也更加致力于民众的文学、艺术及有关理论的学习、探索。由于这种努力，使我在下一阶段的抗日战争中能够置身前线，并为战时前后方文化尽些微力。

日军侵略与全国人民的奋力抵抗时期

1934年春，我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职务，到日本进修，为的是充实自己的民俗学等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进一步为祖国更好地效力。1936年夏，我回到中国，仍住在杭州，从事教学与研究。但是，日本侵略者已经把黑手伸到了华北，国家形势岌岌可危。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暂时形成。全国人民又欢喜又兴奋，因为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就在眼前了。国民党政府为了普及军事知识，加强抗战实力，命令各学校师生都从事军事训练。我工作的学校在离杭州二三十里的一个山坡上，我们每天都练习枪操，精神十分振奋，认为扛枪卫国，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60年代我所作的《花甲杂诗》中有一首就是吟咏此事的。诗云：

关东沃土已沉沦，
逐逐狼心未有垠。
一例练枪期卫国，
非常时节敢因循？

第二年(1937)夏，卢沟桥抗战的炮声响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感到紧张和痛快。可是，很不幸，当时因为患伤寒病，

我正僵卧在杭州一家医院里。直到敌军迫近这座危城时，我才被用山箠抬离杭州，溯富春江西上，直到女埠这个小市镇，才住下来休养。病稍愈后，又由上饶转南昌、衡阳，最后到达桂林，暂时在从无锡移来的江苏教育学院等校讲课。

当我初到桂林时，适遇原来暂驻衡山的联大转移昆明，一部分师生都从这条路走。我在湖边旅馆见到朱自清先生，跟他谈到战区和沦陷区文物遭破坏的情形。朱先生用坚决、自信的口气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他说出了当时我国大多数头脑清楚的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这时，我任教的教育学院，地址在漓江东边的七星岩旁边。我的住所却在城内榕湖附近的马皇背。白天日机常来轰炸，市民都跑到郊区的岩洞去躲避。但避不胜避，往往就蹲在寓所里不走了。有时飞机投弹，落在住所前后，那古屋的尘埃和墙壁的灰泥，纷纷落到我们头上或地上。我们切齿之余，更加强了抗敌的决心。我当时教的是国文，但在讲解中随处注入爱国抗敌的思想。1983年春，我因参加全国科学规划的会议，重到桂林，会余去找寻南门内的旧居，已经被拆毁，改建了新楼。我不禁地口占了下录绝句：

战时曾寓古南门，
 霹雳妖雷切齿闻。
 谁识传经心事苦，
 花桥风雨往来频。

它多少传述了当时我的境况和心态。